



无乡可依的多愁

故乡在,乡愁在;故乡消失了,乡愁还在我们心里 CFP供图

再有三天就要过年了,出门在外的人们要么已经回到家乡,要么正在准备开启回家的行程。

家乡,或者故乡,是我们这个古老国家历代的诗人们咏叹的主题词。尽管总有“日暮乡关何处是”的思乡之苦,可是,一句“乡音未改鬓毛衰”也能从中读出隐藏着如释重负与淡淡喜悦。故乡最终会成为游子们骸骨和灵魂的皈依之地。

对故乡的思念和向往构成了一种永恒的情感——乡愁,所谓“月是故乡明”,所谓“近乡情怯”。即便你距离故乡千里万里,记忆中的一句乡音、一段画面,足以让你泪流满面。

可是,在今天,仿佛是一夜之间,许多人再也无法体察这种持续了数千年的情感。高楼和水泥马路,取代了土墙、院落与胡同,田野和村庄正在消失,旧有的城市社区格局也不复存在。而人们脑海中的旧时记忆,大都只剩下一些碎片。

乡愁,正在变得越来越“无乡可依”。

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

陈兰

专栏写手,老家四川,长在兰州

从江南到西北,乡愁是三天两夜舟车之苦

尽管在南京生活了三十年,陈兰始终是个恋家的人。这几年,由于各种因素,家却变得越发难回。

1985年,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,兰州姑娘陈兰分配到南京。老公是大学同学,南昌人,不想呆在西北,想回南方。南京对两人来说是个折中的地方,到南昌、兰州都有始发车。

在南京很快结婚生子。儿子出生那年夏天,她还在休产假,便想着怎么都要回家一趟。一个人带着儿子,一个包装尿布,一个包装奶粉,一个盥盆,准备在火车上冲奶粉。三天两夜的火车,折磨得不行。刚开始小孩还挺配合,到了第二天时候,也不耐烦了,又哭又闹极不安生。

十多年前,南京到兰州的始发站取消了,全都改成了过路车,往西北的车票非常抢手,暑假回去都很难买,更别提春节。“这些年,南京到西安的动车有了,兰州到新疆的高铁也开了,南京通兰州的高铁也该快了吧,可就不见动静。”陈兰抱怨。去年过年回兰州,火车票没买着,最后买的是大年初一的飞机票。那天大雾,坐在禄口机场等了四个小时。“回趟家难得不得了。”

好不容易回去一趟,发现“物非人也非”,发了很多微信感慨。

“当年的铁院,改叫兰州交通大学了。几个标志性的老楼都拆了,小时候经常玩的礼堂拆了,1963年苏联专家盖的教学楼也拆了,全都盖成高楼大厦。在我们子弟中学老校址旁边,我还找到几棵老枣树,拍了几张照片。以前打枣啊摘梨啊果树很多的,一起被砍掉了,就剩几棵枣树在那儿。还有一棵臭椿,小时候经常在那下面写作业。去年7月,朋友圈有人发张照片,说那棵臭椿树也倒掉了,虫蛀空了。最后这么一个老物件也没了。真的挺难受。”

回去当然要尝尝记忆里难忘的吃食。“跑到回民区那些街道,冻梨还有卖,还是没有以前那么甜,回民摇着铃叫卖的牛奶也没以前那么香浓,兑水兑得有点多,油茶、奶茶吃下来也不是很好吃,不知道搞什么鬼,找不到小时候的味道。”

还好家里的味道没变,老爸做的“头碗”还是那么诱人。“外面的世界不是我们能支配的。家的味道还留着,但乡愁的确是不太好找了。”

毕飞宇

作家,老家兴化

一个生活在家乡的人,能有什么乡愁呢

毕飞宇已经回到兴化老家,和父母一起忙碌着准备过年。过年,差不多就这两种模式,要么回老家过,要么把二老接过来。

他的童年在兴化农村度过,少年来到镇上,后来到了县城,再后来又到了大城市。总体感觉是:县城里的年味不及乡下,而乡下过年也比不得过去热闹。这也正常,春节是农业文明的产物,过年本来就是一件很“乡下”的事。

毕飞宇并没有什么关于年的特别记忆,“年”就是一个简单而深刻的场景,就在乡下的厨房里。那时候,再穷,再酸的人家也有一间阔气的、铺张的厨房,有的干脆就在正屋。

到了大年三十,每一家的烟囱都昂扬着,炊烟款款地冒出来,灶膛里的火是蓬勃的,又大又亮,锅里翻腾着滚烫的油。

等菜下了锅,香味就弥漫了整个屋子。孩子们很慌地偷嘴,总觉得过年好。大人们觉得孩子们碍脚,孩子们在吃饭的时候会大人们碍脚,就在这样的忙乱中,厨房里挤成了一团。

年味儿淡是淡了,但要让他作出一个选择,他一定是选择现在的春节而不是过去的当年的春节。为什么?那个时候的乡村实在是太穷太匮乏了,为了那个所谓的年味让他去过那个贫困的生活,这是他不愿意的。

“无论当年是多么的有年味,我也不会选择当年。”毕飞宇说,在他的童年时代,海鲜是个不可想象的东西,但现在,在兴化的任何一个餐馆里都可以吃到海鲜。

过年的意义当然不在温饱,从这个意义上说,他是有些怀念过去的春节。可是,他又还是觉得今天好,就是无趣。“嗨,让我说什么都好吧。”

毕飞宇坦言,他没有乡愁,“半点乡愁都没有,一点点都没有,这个不能撒谎的,有就没有了就没有,哪怕这个话说出来有可能会被我兴化老家的人指责,我也要说实话。”



一旦无乡可依成为现实,只有关于故乡的那些记忆能让我们了解乡愁 CFP供图

本版采访对象除海蓉外均现居南京

丁捷

作家,老家海安

故乡变得越来越光鲜,越来越无趣

今年,丁捷照旧准备出去过年。记忆里,老家海安的春节,跟“辞年”和“守岁”这两个字眼紧密相关。

小时候,父亲在镇上一个小单位任“二把手”,每年除夕,都见他忙着给家里长辈送年礼,给晚辈压岁钱,还有,拿着小笔记本清账。父亲经常过得囊中空空,也没见谁给他送过一块糖一分钱。丁捷纳闷,为何总是“只进不出”。母亲说,这就是一家之主,得处处担待着。

有年除夕,父亲突然收到他人人生中第一笔大年礼:一条大青鱼,一大块猪肉。厂里几个工人代表一起送来的。父亲冒着得罪上级的风险,帮他们打赢了一个官司,挽回了工人们的一大笔辛苦钱。工人们为表感谢,就派代表上门送年礼。感情难却,父亲招待大家吃了顿丰盛的年夜饭,“一起守岁”。

初中有一个阶段,丁捷学习成绩下降得厉害,父亲一般要忙到除夕才记得查成绩单。看到分数,父亲慢条斯理地说,“这孩子,不弄两下怎么辞年啊!”

14岁那年,丁捷有了第一笔收入,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文章,还在杂志上发表了一手小诗,让他有了11块钱的积蓄。那个除夕,丁捷提出来要给父母压岁钱,父亲很开心:看来,今年要唱个歌跳舞“守岁”了。

“家乡语言中,表达辞旧迎新,仇则辞年,喜则守岁,有些东西要辞掉,有些东西要守住。方言的奥妙,就是生活的奥妙,就是人生的奥妙。”丁捷说。现在,故乡已经回不去了。老家面貌的变化着实让他喜悦,乡间马路拓得足够四辆车并行,乡邻们建起了新房,但他觉得这种喜悦是短暂和浅表的。因为乡情变了,“人缘”不在了。而当年那些一起挨过巴掌,一起等着“辞年”的小伙伴们已经四分五散,现在回去面对的都是老人和妇孺,没有太多的共同记忆,情感上也难相通。

“在我看来,构成家乡的那些人比物更重要。失去家乡并不是失去童年走过的小桥,蹚过的流水,住过的小屋,更痛的是失去你的人缘。故乡已不是母亲,不是港湾,而是一个远亲,一个驿站。故乡变得越来越光鲜,也越来越无趣。而我们就像是浮萍,没有根。”

既然无法安放乡愁,干脆在别处寻找一点新鲜吧。这些过年过春节,丁捷总是带着家人,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把心放空。某一日她在街头闲逛,从大街转入小巷,忽然从某小音

海蓉

著名DJ,籍贯武汉,北京读书,南京成名,现居加拿大

乡愁是很玄的东西,会在某个时刻悄然来袭

“安逸,就是与家人同在,在一个宜居的地方有一张床,就是有一个可以喝茶看海的地方。”2月11日,海蓉在朋友圈晒了组海滩,配上这段文字。

今年,早早决定跟父母、公婆,还有弟第一家十几口人在三亚过年。2月9日,各路人马先在广州白云机场会合,从广州开车到徐闻县海安码头,乘船过海到海口,然后开车去三亚。

一路向南,天气渐暖。南方的植物花卉丰富又滋润,看着就让人欢喜不已,气候好,心情好,海蓉觉得感冒也好转得快。

海南的房子,今年要装的人实在多,只得又添了四张折叠床,让孩子们睡。

安装家具这种体力活,海蓉也帮不上什么忙。她一边看着老公忙碌,一边拍照片发朋友圈,以资鼓励:“会干体力活的男人最帅,我负责鼓掌喝彩”。

1985年,海蓉从北广毕业分配到江苏电台,后来去美国留学,现在定居加拿大。

待过的地方太多,家也很多,“故乡”之于海蓉,是个模糊的概念,甚至有点不知道该把哪里算作故乡。籍贯武汉、出生于泰州、在西宁长大、在北京求学、又在南京成名,后来去美国留学,到过瑞典、北京工作,最后定居加拿大,现在每年也是温哥华、南京两头跑。

回顾这些年的经历,海蓉发现自己怀念的没有哪一个具体的地方。而最近一次回武汉老家过年是在20年前了。要说乡愁,她还真没什么体会。

当年她只身负笈美国,大半年来,自觉适应力颇强,吃得穿、睡得,活得兴兴头头,对于彼岸的家人亲友,自觉并没有太强烈的想念之情。

某一日她在街头闲逛,从大街转入小巷,忽然从某小音

对话



《中国在梁庄》作者梁鸿

乡愁是与自然相互依偎的感觉

“明天就回家了。”人在北京的梁鸿正准备回老家河南过年。梁鸿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。前几年,她写了一本书,记述了自己的故乡河南邓州穰县梁庄近30年来的变迁,叫《中国在梁庄》。外界评论挺高,有人说:“《中国在梁庄》书写了当下中国村庄的普遍性命运,它让我们感同身受、辗转难眠。”书出版了,得了奖,出了名,那年春节她却没敢回家,怕被家乡人说“怎么把老家写成那样”。

外地人过年总是要回家的。宅在北京过年的那次,看着人潮陆续出城,到了腊月二十八九,北京就成了一座空城。正月里也跟着北京当地人去看庙会,却总觉得少了什么。城市太大,空荡荡的,心里也是空荡荡的。所以,过年还是得回家。

于奎潮

出版人,老家东海

我们注定将与自己的故乡,越来越远

今年儿子要高考,时间比较紧张,于奎潮第一次在南京过年。

第一次离开老家东海是1979年,乘绿皮火车,从东陇海线向西,到徐州中转,改乘京沪线,站票,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报到。在铁路工作的大哥帮他办好转乘手续,把他送上车。那年,他19岁。

故乡是苏鲁交界处一个叫桃林的镇子下面一个村庄,交通闭塞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通电。那是他外祖母所在的地方,母亲下

不喜欢听流行歌曲。可是在纽约的那一个下午,她却在巷子里将那首歌听了一遍又一遍。

“也许,乡愁就是一种很玄的东西,它常常在说不清楚不明的某个时刻,悄然来袭。”海蓉说。

人到中年,生活也安定下来。父母、公婆都住在南京,离海蓉南京的家很近,每次回国回家都没什么特别的感觉,每周都会聚一下。过年更是亲家、兄妹们全家20几口人聚在一起,热热闹闹一大家子,很有过年的气氛。

因为相聚容易,也就没有什么离愁别绪。在海蓉看来,家人在哪里,故乡就在哪里。家不是那个老房子,家实际上只和家人、亲情相关,如果回到家里,却不是回到所期待的那个包容、安全、温暖的怀抱,那自然会“在家想家”。

“时代变了,家人也变了,每个人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轨道,如果平时疏于沟通,那么大家坐在一起当然不知道该说什么,心与心之间也会疏离隔膜。现在空间的距离,基本不再困扰我们,倒是心灵的距离需要我们细心地呵护对待。”海蓉说。

“时代变了,家人也变了,每个人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轨道,如果平时疏于沟通,那么大家坐在一起当然不知道该说什么,心与心之间也会疏离隔膜。现在空间的距离,基本不再困扰我们,倒是心灵的距离需要我们细心地呵护对待。”海蓉说。

“时代变了,家人也变了,每个人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轨道,如果平时疏于沟通,那么大家坐在一起当然不知道该说什么,心与心之间也会疏离隔膜。现在空间的距离,基本不再困扰我们,倒是心灵的距离需要我们细心地呵护对待。”海蓉说。

梁周刊: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“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”。

梁鸿:是的,乡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浓郁。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,人们看到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凋落,没有秩序,而不单单是家里的老屋塌了,记忆中的河流再也没有鱼。整个社会的迅猛发展,在乡村有一种显性的体现。这些一下子摆在你的面前,你就会强烈地感觉,自己的故乡沦陷了。

梁周刊:我们今天的“乡愁”,更多的是什么呢?

梁鸿:乡愁已不再是李白的乡愁,不再是唐诗宋词的乡愁,不再是狭义的乡愁,现在的乡愁已经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,是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乡愁,中国的乡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,人的本源被急剧抛弃,人与自然没有关系了,与四季没有关系了,被孤零零地悬在都市的钢筋水泥里,这时候的乡愁是怀念人的自然属性,想念的是与自然、与大江大河的一种相互假借的感觉。

乡愁有了质的变化的。现代意义上的乡愁,更多的是寻找一种传统。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乡愁的,它是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感,在每个人的心里蔓延。

梁周刊:现在,乡愁是一种隐约的恐惧感?

梁鸿:是的。当有一天,你回望,突然发现你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,你的根没有了,人生活在时代的洪流之中,你连回头的地方都没有了。现在明白,那不过为有一段适当的距离,可以把家乡张望。乡愁是什么?乡愁是距离的产物,是对他处的情怀。关山阻隔时,乡愁会浓得化不开;如今交通便利,通讯发达,乡愁依然存在,为何?为过往的岁月,为我们留在过去时光里的记忆,为我们成长过程中的欢乐与疼痛。乡愁和地域,更和人事联系在一起,和父母、亲人,和健在的人和故去的人联系在一起。真正的乡愁是我们的成长和走向老境,这是永远无法超越的,这也是乡愁根深蒂固的最深层的原因吧。我们注定将与自己的故乡,越来越远。”于奎潮说。

梁周刊:如何找回故乡呢?

梁鸿:找回故乡,广义上,实际上是找回曾支撑维系我们这个民族发展的最朴素的道德方式。从自己的故乡出发,思亲家人、邻居,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需求,然后再来思索这个时代的发展。

重新找到自我,就是重新找到故乡,这既是自己的自我,也是民族的自我。现在,我们的国家需要找回它,否则有一天,如果我们没有一点点寻找的渴望和痕迹,我们的发展,很可能成为了别人的影子。